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30个国家首脑签署的联合公报提出“电子商务、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科技园区等领域的创新行动计划”,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来说,中国数字化企业的产品能力和资产实力具有较强吸引力,而面对日益扩大的“一带一路”新兴市场,中国数字化企业将迎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如何共建数字“一带一路”?

强化智库建设中的政府职责

政府作用的发挥程度直接决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质量,因此要准确定位政府角色,充分实现政府责任,推进智库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 颜佳华

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作用的发挥程度直接决定了中国特色智库的建设质量。因此,要准确定位政府角色,充分实现政府责任,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制度建设的供给者

制度是关于组织和个人活动的结构性安排,是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变量,要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制度供给者的作用。

政府应着力完善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需求侧制度体系。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有赖于强烈和持续的社会需要。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各级党委、政府对高水平政策研究成果有持续强烈的需求,是支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跨越式发展的现实基础。为此,应从法律上完善政府重大决策的专家咨询制度、听证制度,将智库的参与作为重大决策制定的前置程序。同时,要大力推动现代决策体制改革,实现“谋”“断”相分离的同时又紧

密互动,加强智库的“谋”与政府的“断”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深化政府决策过程与智库咨政服务的联系。

政府应着力完善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供给侧制度体系。新型智库建设供给侧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内外部制度改革优化智库职能,提升智库效能,增强智库影响力和公信力。当前,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绩斐然,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如极少数机构借科学研究之名,行聚敛钱财之实;一些机构内部治理机制混乱,导致运行低效。为此,政府应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完善的智库管理制度体系,建立严格的智库管理机制、智库内部日常运行监督制度以及多元化的外部监督机制。

活动平台的搭建者

西方国家智库活动平台的构建工作有些值得我们借鉴。建立智库参与政府和议会决策的专门机制,允许智库通过参加议会专门听证会、发布研究报告等方式影响政府和议会。同时,积极拓展智库活动的国际平台。从西方国家智库发展的实践

看,由国家或区域政治组织为后盾成立的一些重要智库活动平台如达沃斯论坛、全球财富论坛等,在提升西方智库影响力、传播西方价值和文

化、引导国际舆论、形成国际议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这些平台构成了西方重要智库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基础。据《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发展在活动平台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缺乏制度化的机制;国际性的高水平智库论坛建设还相对落后,对国际舆论和国际公共议程的建构能力亟待加强。为此,政府应着力搭建特色新型智库的活动平台;应拓宽智库参与渠道,健全智库参与的体制机制,从制度上保障智库参与政府决策和政治协商的权利,从程序上强化智库参与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应积极配合国家战略,努力提升国内智库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权威。在这方面,可借鉴国外做法,形成国家领导人到智库演讲的惯例,增加重要智库的曝光率,提高国际影响力;同时还可结合国家发展的战略决策,围绕全球治理重大问题,在巩固和发展现有博鳌论坛等平台的基础上,搭建新的智库活

动平台,如配合“一带一路”的布局,建立一个由“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参与的大型智库论坛,形成智库对话平台;亦可就环境保护、非传统安全、反贸易保护主义等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建立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专门性智库论坛。通过这些平台的搭建,为中国智库提供广泛的国际舞台,同时凝聚各国智库智慧,探讨共同发展,谋求共同繁荣,创新合作机制和改革制度安排,化解各种冲突和分歧,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人才基础的建设者

人才是特色新型智库高水平、跨越式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西方国家高水平智库在当今世界地位和影响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智库人才队伍。其较为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和“旋转门”机制形成了政府与智库在人力资源上的共建共享局面。

相比较而言,我国智库与政府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人力资源上相互隔绝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编制身份的固化使得智库人员难以进入政府机构,导致智库人员对政府管理和政策制定不免雾里看花,难以真正发挥咨政作用。

——对智库地位认识不足,使得有实践经验、有研究能力的政府官员难以向智库机构流动。

——智库投入不足、待遇有限,使得青年才俊很少将进入智库作为职业选择。

对此,政府需加强特色新型智库的人才基础建设。首先,要着力建设中国的人才资源互通机制。一方面,需要探索建立了解政府管理与政策制定过程、具有政策研究能力的政府公务员向智库交流的机制。可以采取留职学习,定期选派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的政府公务员到重要的智库单位学习,学习期间保留其在原工作部门的职位和待遇;同时还应注意引导政府部门退休的领导干部进入智库工作。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吸纳优秀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以提升政府管理与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效率。目前较为实际的途径是建立健全智库研究人员到政府机构挂职的工作机制,定期吸纳智库人员到政府机构挂职锻炼。其次,要加大对智库人力资源建设的投

入,提高智库工作人员待遇,增强智库研究工作的吸引力。如此坚持下来,我国智库人力资源状况定将得到极大改善。

资金保证的支持者

充足的资金是智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极大地夯实了智库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成为智库拥有国际影响力的物质根源。而我国智库特别是一些民间智库则往往因为资金来源渠道有限,财政上捉襟见肘而身处窘境。因此,在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仍需强化和优化政府财政支持。

政府应统筹不同性质智库发展投入。当前,政府对智库的投入在不同性质智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有数据表明,我国民间智库资金严重短缺。相对于官方、半官方智库,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民间智库由于没有体制上的约束,更能采取公众立场,从社会大众福祉出发思考问题。但政府在财政投入上的不同,使得不少民间智库组织因为财政困窘,难以有效顺利运行。因此,政府应该出台相应制度规范,为各种不同性质的智库争取财政资金支持创造平等公正的平台,使得民间智库也有可能通过高水平的政策研究和咨政服务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

政府应健全和优化投入机制。西方发达国家智库繁荣发展的经济基础在于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在这方面,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应承担起责任,健全和优化智库投入机制。一是完善政府常规资助机制。改革方向是逐步减少以具体课题项目为途径的资助,进而转变为常规性、整体性的资助,降低资金利益对具体政策咨询的影响。二是完善基金会捐助机制,通过社会组织设立智库类专项基金,接受政府、企业及全社会的捐赠,科学运作管理基金,建立基金捐助智库的通道,同时鼓励其他基金会对智库的资助行为。三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改变过度依赖部门内研究机构的传统做法,向智库机构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和政策评估服务。

综上所述,各级政府应该根据中央关于智库发展的意见精神,着力完善智库发展的制度体系,搭建智库发展的高水平平台,为智库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财政支持,为智库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氛围。

引入智库推进政府决策民主化

可实现权力理性化与知识价值化的良性互动,在参与渠道、人才交流等层面构建政府决策与新型智库的微观互动机制

□ 卢文超

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引入新型智库的有效参与,实现权力理性化与知识价值化的良性互动。为此,要打造开放、共享的“金鱼缸”政府,提升智库的专业性与独立性,在参与渠道、参与文化、人才交流等层面构建政府决策与新型智库的微观互动机制。

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引入新型智库的有效参与,实现权力理性化与知识价值化的良性互动。为此,要打造开放、共享的“金鱼缸”政府,提升智库的专业性与独立性,在参与渠道、参与文化、人才交流等层面构建政府决策与新型智库的微观互动机制。

决策与智库须良性互动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加强执政地位,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与基本保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体现在决策的公共性、决策的合理性、决策的合法性三个层面。在决策背景日趋复杂化的今天,智库的成熟程度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公共

决策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政府决策,咨询先行是基本要求。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任何决策者的信息与知识是有限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决策者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决策问题,日益动荡的决策环境,爆炸式增长的数据,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使决策完全理性无法实现。在政府决策中,只有智库专家的参与才能导入必备的知识信息与理性计算,汇集民意民智,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决策失误,实现决策权力的理性化、合法化。

新型智库也需要通过助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实现知识的价值化。知识是信息的载体,具有时效性,唯有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及时转化为现实应用,才能实现社会价值。智库通过参与政府的政策议题、获取政府的经费资助与政府购买进行知识生

产。智库专家也需要通过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实现自身的职业利益与专业声望。因此,围绕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决策者与新型智库构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平衡的新型伙伴关系。

智库成长需要宽松环境

开放、共享的政府能够为新型智库的发展提供信息资源。优化新型智库成长的制度环境,必须加快政务公开与信息公开,打造“金鱼缸”政府:不仅知道自己是如何运作的,让外部也能观察到自己的运作。要加强政府对权威性信息的及时发布,方便新型智库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兴信息发布平台获取相关信息。

开放、共享的政府为新型智库参与决策提供制度空间。在复杂的公共事务、不确定的决策环境中,单纯

借助大数据不能实现智慧决策。只有与智库专家基于信息进行讨论,接受专家职业性研究的帮助,决策者才能克服信息超载与价值混乱。开放、共享的政府在理念上注重变单方主导为“我们”共同决策,以开放性姿态,积极寻求智库知识资源的流入。政府决策者由职业官僚转变为共识寻求者,在思想、信息与知识相互碰撞与激荡中,焕发政府政策制定的创造力,为新型智库发挥决策的“外脑”功能营造宽松、包容的制度环境。

专业性是新型智库竞争力、创新性与美誉度的坚实保障。人才资本是新型智库的核心资源,对国家级高端智库应通过资金与政策倾斜,吸纳一流人才,带动整个智库人才队伍的梯次发展。优化智库的人才结构,要根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加快形成党政部门、社科

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同时,完善智库人才评价机制与激励政策,探索有利于智库人才发挥作用的多种分配方式与薪酬制度。

据《人民日报》报道,独立性是新型智库提供优质公共政策产品的信誉基础。作为智库,关键是要保持独立性,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信条。保持智库的独立性有助于扩大政策民主,启发政府决策者。新型智库秉持价值中立、科学公正的原则,防止为一己之私被利益集团“绑架”,有助于提出客观、公允的政策建议,维持自身较高的公信力。同时,新型智库也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避免误解“独立性”而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对立”状态。



国际智库机构罗汉堂发布最关乎人类未来的十大问题

阿里巴巴倡议成立的国际智库机构罗汉堂近日在杭州发布最关乎人类未来的十大问题。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现场发布了这十大问题。他表示,数字经济的变化已经超乎想象,这十大问题对未来的影响不可预估,因此,充分了解它们可能带来的影响迫在眉睫。图为发布现场。

魏晔 摄